

近三十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方 铭

提 要 20 世纪开始的现代屈原及楚辞学研究,以 1949 年为界,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而 1949 年至今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又可大体以 1979 年为界,之前为第一时期,之后至当下为第二时期。1949 年以后的屈原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77 年以后至今的 30 多年,是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关键词 屈原 楚辞 楚辞学

屈原及其作品产生以后,屈原及楚辞的研究就开始了,到今天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屈原及楚辞研究历史之悠久,在中国所有的学术研究中,只有孔子及经学研究可以超越它。褚斌杰先生在分析屈原及楚辞学发展、繁荣的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时指出,屈原及楚辞研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更主要的乃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①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历史广度和深度,仅次于孔子及经学研究。换言之,从事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学者的目标,并不局限在历史的重现和复原这一基本学术目的,同时也要着眼于中国思想文化今天与将来的建设和重构。

20 世纪开始的现代屈原及楚辞学研究,以 1949 年为界,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而 1949 年至今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又可以大体以 1979 年为界,1949 年至 1976 年为第一时期,1977 年以后至当下为第二时期。

一 20 世纪初至 1949 年前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现代中国屈原及楚辞研究开始的标志是王国维 1906 年发表在《教育世界》总第 140 期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从南北地域的不同解释南北文化的不同,由南北文化的不同解释楚辞的独特性,以“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来解释屈原作品的伟大成就。但就地域文化研究屈原及楚辞而言,王国维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楚辞辞楚的认识,早已是古典屈原及楚辞学者一致公认了的。但是,王国维的研究视角却与他接受西学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相关,所以,王国维的研究可以看作是现代楚辞学的肇始。梁启超 1922 年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的讲演稿《屈原研究》及 1923 年在清华学校的讲义《要籍解題及其读法》之《楚辞》部分,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无量《楚辞新论》,1926 年北新

^① 褚斌杰先生《导论:百年屈学》,见褚斌杰先生主编《屈原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8 月出版。

书局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等著作,则标志着现代楚辞学的完成。

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屈原研究》考察了屈原的历史及游历、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思想、屈原的政治斗争、屈原对社会和人民的热爱、屈原的生死观、屈原的艺术特点等七个问题,梁启超能站在中国文学史的高度来考察屈原的价值;能运用二十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学术法则来考察屈原。比如哲学与文学的联系、历史的、地理的、环境的、自然的及个人经历诸因素与文学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心理学与创作的关系等等;能立足于20世纪民主革命的高度来考察屈原思想的积极意义;能站在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概括屈原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梁启超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上的特点,未必能促使他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得出与中国古典屈原及楚辞研究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是,他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上具有了世界性特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由于梁启超《屈原研究》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上所具有的世界性的特点,必然使他的结论具有空前的创新性,而这个创新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梁启超把屈原及楚辞纳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之中了。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学校的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楚辞》部分,也正是贯彻了他的这种新的革命性成果。

谢无量与游国恩先生继承了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谢无量的《楚辞新论》用南北不同的文化传统来理解楚辞与《诗经》的不同特点,在讨论屈原的思想及影响时从楚国的地理、音乐、屈原的政治抱负三方面入手,对屈原及楚辞学术史进行了研究。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是对屈原及楚辞重要作品的全面论述,其内容涵盖了屈原及楚辞研究的重要方面,比梁启超和谢无量的研究都深入和全面。同时,游国恩先生在讨论楚辞来源的时候,不是强调单一原因,而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诸因素。他认为楚辞的产生受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和楚地民俗歌舞、山川地理的共同影响,如认为《诗经》、《道德经》及南方民歌等与楚辞皆有历史渊源;又认为楚辞创立了自由的新形式,是汉赋、六朝骈文及七言诗的鼻祖。游国恩先生还注意运用古典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的文献梳理和考订工作,在讨论作品及作家时,注意文学的演进规律及时代背景对作家的影响。游国恩先生在树立世界性研究观念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古典屈原及楚辞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自此而后,一直到1949年,现代屈原及楚辞研究者,大体都是遵循着这条路前进的,其中影响重大的学者包括郭沫若、闻一多等。

二 1949年至197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学术研究不再是私人之事,而是有明确地为政治服务的艰巨任务。也正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变成了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屈原研究也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值得庆幸的是,屈原及楚辞作品在1949年的政治巨变后,并没有被划入反动阵营之中,相反,屈原及其作品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屈原也受到了空前的尊重。因此,在1949年至1976年之间,屈原及楚辞研究存在有大量非学术化的内容的同时,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中国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屈原的高潮。其中主要的论文都收集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研究论文集》之中,该文集中最重要的文章是讨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问题的。如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郑振铎《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唐弢《人民的诗人屈原》、褚斌杰先生

《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陆侃如《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等。另外还有讨论屈原现实主义、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问题的一些论文。

梁启超等人开创的世界性视野,建立在方法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基础上。但是,1949年以后,多元的世界眼光和多元的价值判断归结为单一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化、标签化的研究思路。不过,由于屈原被确认为爱国主义诗人和人民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刘永济、姜亮夫、林庚等人研究屈原及楚辞的著作也得以出版或重印,这些学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他们仍然在新时期极大地发展了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普及运动的开展,陆侃如和高亨等人合作编选了《楚辞选》,马茂元也有《楚辞选》问世,而文怀沙则试图把屈原的作品翻译成白话文。所有这些工作,既代表了主流意志主张普及屈原及楚辞作品的愿望,也为非专业研究的屈原及楚辞学习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平台。

三 1977 年以后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大部分学者主张把 1949 年以后的楚辞研究以 1979 年为分界,但是,考虑到某种研究风格的变化,总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在分期的时候,应该重视的是带来这种缓慢变化的标志性事件,而不是仅仅关注这种变化的最终完成。1976 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拨乱反正的工作到今天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最近三十多年文化和学术的变化,无不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因此,把 1977 年作为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无疑是合适的。

1977 年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是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不仅是源于这个阶段的屈原及楚辞学者的数量是过去没有办法相比的,也是因为这个阶段有关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论文及著作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对古典屈原及楚辞研究的重视,又体现了现代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的学术眼界和学术态度。

概括而言,最近三十年的屈原及楚辞研究,主要集中在楚辞文献整理、楚辞文本研究、屈原及楚辞的文化研究、屈原及楚辞的接受研究四个方面。

在文献整理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出版了大量的 20 世纪以前古典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著作,如 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楚辞集注》,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楚辞补注》,嗣后,对历代屈原及楚辞研究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持续不断。另外,还有部分屈原及楚辞的重要文献被影印出版,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把中国屈原学会部分学者申请的《楚辞珍稀文献集粹》纳入出版资助规划,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也继续支持了《楚辞珍稀文献集粹》及《楚辞珍稀文献集粹提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崔富章、黄灵庚、周建忠等学者把精力投入到屈原及楚辞文献的目录研究、版本研究和楚辞文献提要研究方面,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基础工作的开展,既是三十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三十年和以后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献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大量的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楚辞新注本的涌现。1980 年以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游国恩先生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以及崔富章等学者共同完成的《楚辞学研究文库》,更是大量楚辞注本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对屈原、宋玉等人楚辞作品的分析和阐释,是楚辞文本研究方面的主要内容。由于楚辞文本研究方面涉及的问题多,所以关注这一部分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数量最多。几乎所有的楚辞作品,都有人进行细致研究,大到作者、创作时代、作品主题、作品艺术特点等全局性问题,小到某一个字词的训释,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观点。虽然这些论文未必都是有价值的,也未必解决了楚辞文本的所有问题,但是,这些论文却为我们接近解决楚辞文本中的疑难问题和正确认识楚辞文本的价值提供了重要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三十年,出土文献研究对楚辞的文本阐释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对楚辞具体作家的评价方面。如汤漳平、谭家健等人对出土文献《唐勒赋》的研究,不仅促使我们改变20世纪初期学者对宋玉赋和赋文学发展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楚辞重要作家宋玉的成就,并对楚辞与赋之间的演变关系有个较新的认识。

最近三十年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实际上是逐渐摆脱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研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就是逐渐建立屈原及楚辞研究的文化研究功能的过程。屈原及楚辞研究,归根结底是个历史文化问题。从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去解读屈原及其思想及经历,才能还原屈原的真实面貌,了解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化价值。

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学者们运用了比梁启超等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丰富的价值判断。同时,随着对历史文化丰富性的认识,我们对屈原及楚辞的认识也更趋合理,比如关于屈原与楚文化的关系问题,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对马王堆和曾侯乙墓挖掘成果的重视,主流意见强调楚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而到了最近一些年,随着对郭店楚简研究的深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又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最近三十余年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是屈原及楚辞学术史研究及影响与接受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学术界开始关注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历史,也关注屈原及楚辞对后代学者和诗人的影响与接受。既关注屈原及楚辞在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作家身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共性,也关注屈原及楚辞在海外的研究状况和传播情况。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还不很充分,但是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古典时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是封闭的体系,20世纪以后至1949年,中国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大陆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不仅与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隔绝,也基本与日本、韩国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隔离,中国领导人与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也使前苏联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学者与中国学术界脱离了关系。1977年以后,这种局面在逐渐改善。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和港澳台学者及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济济一堂,偶尔我们也会碰见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南美、北美以及非洲、澳洲的楚辞研究学者和杰出的研究成果,这都表明最近三十年的确是让屈原及楚辞学研究中国化和世界化了。

(作者通讯地址:方铭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 100083)

(责任编辑 晓文)